

现代化农业机械初显神通

编者按：请大家都来看这个好消息。在辽阔的“北大仓”原野上，只有二十个农业工人的一个小队，使用引进的先进农业机械和运用科学种田方法，耕种了一万一千亩土地，平均每人生产粮食和大豆二十万斤。这个农业现代化试点的成功，是党中央决定利用外国先进技术来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的一个试验的初步胜利。它对于我国逐步改变几亿人搞饭吃的落后局面，为我国农业高速发展带来了可喜的消息。

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创造了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有关各方面的工作必须迅速进行很大的改革，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的要求。我们只有认真总结和推广这次试点的经验，认真研究和解决一系列新问题，才能促进我国农业战线出现一场巨大的革命。

新华社哈尔滨十月三十日电 本社记者李普从黑龙江省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报道：这里今年采用具有七十年代水平的国外农业机械和科学种田方法，种植大豆和玉米一万一千多亩，已经获得丰收，亩产分别比去年增长两成和七成多。加上几千亩油菜和其他作物，全队二十名农业工人，平均每人种地近千亩，产粮二十万斤。我国农业中首次出现的这一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对于逐步改变现在几亿人口搞饭吃的局面，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在深秋的阳光下，我们来到二队田间。只见玉米秆高穗大，大豆果实累累，三台大队的联合收割机正在工作。这种收割机工效高，作业质量好，收割、脱粒等几道工序一次完成。它乘风破浪般地前进，所过之处，把玉米秆、玉米芯切成一小节一小节，均匀地撒在地里作肥料。转眼之间，一大片庄稼就被割光了。金黄的粮食，随即由运粮车运到晒场。

这批机器，是四月上旬开始从国外运到的，共六十台（件），包括从耕、播种到收割、运输和粮食加工的各种机械。那些拖拉机既是牵引农具的动力，又是操纵农具的枢纽。它牵引的旋转锄，八小时能松土两千亩左右。它牵引的耕犁机，作业面宽达十八八八，八小时耘地一千多亩。

黑龙江省无霜期只有一百二十天左右。过去大秋作物的春播时间一般要半个月，播得较晚的地块往往庄稼没有成熟就遭到霜害，大幅减产。今年二队试用这种新的播种机，不到五天就全部播完了，为庄稼赢得了比较充裕的生长期。

我国农村每年都要为农作物间苗锄草耗费很多人工，黑龙江地多人少，困难更大。二队今年的玉米用精量点播机播种，一亩玉米下一粒籽，一粒籽长一棵苗，不仅节约了种子，更可贵的的是把间苗这件费时费事的活儿省掉了。同时，由于喷洒了除

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农业现代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现代化究竟是怎么回事？应该怎样搞法？这是全国人民普遍关心又十分陌生的问题。今年四月，国家从美国陆续引进了一套具有七十年代水平的农业机械，交给黑龙江省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搞农业现代化试点。秋收时节，我们来到辽阔的三江平原，访问了这个生产队，所见所闻，使我们大开眼界。

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北大仓”的耕地上，玉米长得秆高穗大，籽粒饱满。引进的联合收割机正在收获，但是，辽阔的田野静悄悄的。通常北方农村秋收时那种镰刀挥舞、人欢马叫的热闹场面，在这里竟看不到了。

一台草绿色的一百四十五马力的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田野里乘风破浪般地前进，就象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中的大型游艇一样，不同的是它的速度几乎能赶上城市的公共汽车。它那六米多宽的割台，象一把巨大的理发推子，不会就把玉米地推了个半边光。它的大肚皮里面，急剧地在处理“食物”，玉米籽粒被剥落下来，秸秆和玉米芯被切碎后均匀地撒在地里当作肥料。一台载重十一吨的运粮车早就在地头等候，及时地把金黄的玉米粒运往场院。一万多亩耕地上这一连串的秋收活动，总共只由三台联合收割机、三台运粮拖车、六个驾驶员和三名助手，（助手本来不需要，主要是跟班学技术）在半个小时内就轻松愉快地“包”了。而去去年这个时候，二队男女老少三百多人一齐上阵，吃早食黑拚命干，光是把庄稼从地里收到场院，就足足忙了一个多月。等到脱粒完毕，粮食入库，已快赶上过年了。

在队部办公室，管生产的副队长肖士斌喜气洋洋地拿着一份报表对我们说：他们使用引进的这套农业机械，粮食亩产比去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全队二十名农业工人，平均每人种地九百七十亩，创去十六万斤油菜籽不算，每人全年生产粮食和大豆二十万斤。这么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在我国农业史上还是第一次。

我们向肖队长祝贺。大家都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利用国外先进技术的办法来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决策，感到欢欣鼓舞。

安乡在前进

——中共安乡县委整风后的一些见闻

夜深了，中共湖南省安乡县委书记刘淑元同志，从北京参加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回来，还在灯下读着一封封干部、群众的来信。许多同志从《人民日报》上看到安乡整风的报道后，怀着对家乡关切的神情，对共同事业的责任感，写信支持、鼓励县委。读着亲人的信，刘淑元同志思绪万千。今年春天，当她和县委其他领导人，在会议上，在村舍里，向干部和群众检查县委的错误时，许多同志也曾鼓励他们说：不要光检查了，挺起腰杆来带领大家干吧。她想起刚担任县委书记的时候，曾下定决心：一定要勇敢地挑起担子。今天，她对自己肩上任上的分量，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决心恢复和发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用实际行动回答党的关怀和群众期望。

坚持实事求是 不说空话假话

整风以后，中共安乡县委把转变作风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坚决反对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县委十分重视落实农村各项经济政策，专门举办了有公社管农业的副书记和大队会计参加的政策学习班，重温“六十条”和省委的有关规定，总结这几年减产虚报的教训，

要求做到人人讲政策，事事讲政策。县委专门把有关粮食政策的条文摘抄印发到各个生产队，出安民告示，宣布不购过头粮。安文公社春粮、早稻获得了大丰收，一季完成了全年征购任务，县委表扬了这个公社。可是，就在这时，刘淑元同志从人民来信中了解到，有的生产队没有按省委的要求留足到年终分配前的口粮，便在县委召开的公社书记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要他们认真检查一下。公社通过调查，了解到全公社一百五十八个生产队中，有十九个生产队没有留足五个月口粮。于是立即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进行检查，摆正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问题，从入库中退出了五万三千斤粮，补足了社员

的口粮。县委在全县普遍检查了一次非生产性建筑问题，发现：一九七四年以来，有五个公社修建了招待所之类的非生产性建筑，其中有安金和安文公社。开始，有的同志认为，安金公社是全县的先进公社，安文公社是为迎接全省群众文化工作会议修招待所，非生产性建筑工作也不大，不必上报。县委副书记杨振东同志坚持说：对先进单位不能补短，向上级汇报不能缩小错误。县委如实上报了情况，并主动承担了

省委加强领导 采取切实措施

江苏农村千方百计抗旱播种

新华社南京十月三十日电 江苏省农村广大干部群众正在千方百计挖掘水源，抗旱播种，抗旱保苗。目前，全省三麦（大麦、小麦、元麦）二豆（蚕豆、豌豆）的播种面积已

的洪泽湖地区，突击翻水，帮助解决那里抗旱急需用水的问题。

现在，一场大打抗旱播种、抗旱保苗的人民战争已在全省普遍展开。广大干部、群众除充分利用现有水利设施浇灌外，还充分发挥人力、畜力和

责任，坚决制止了随意动用国家和集体资金、平调农村劳动力搞计划外基建的歪风。

早稻丰收时节，一批批基层干部和群众、县直属机关干部、农技干部，来到安文公社官民大队第七生产队，验收县委副书记罗晓斌同志的试验田。象今年这样组织一批批人来验收评议，还是第一次。在验收中，罗晓斌同志叫大家把生产队的田亩全部丈量，逐丘鉴定验收，发现生产队少算了五亩，便叫如实地补上。验收结果：今年试种的五十亩无泥温室育秧试验田，亩产八百零八斤。大伙边看，边评议，边总结，先进经验也就从这里传播开了。

闻过则喜 知错就改

六月中旬，全县进行了一次生产大检查，重点放在县委常委和公社书记的点上。当检查的同志来到安文公社六家湾大队第八生产队，见早稻田间管理粗糙，禾苗长势不好，大家很不满意。这里是县委常委、安文公社党委书记张光彩同志的点。要是在过去，大家可能只在私下议论，而县委书记刘淑元也会考虑提出批评会不会影响关系，伤了感情。

（下转第二版）

到今后抗旱大量用水的需要。省委提出，要“向长江要更多的水，向地下要更多的水”。目前，正在着手规划，准备实施一些必要的工程项目：在淮北大打机井，挖掘地下水源；修建江都抽水机站的配套工程，提高向北供水能力；补充淮北区抗旱水源；挖深和延伸镇宁地区通入通湖的河道，提高镇宁丘陵山区引水蓄水的能

虚心向老工人学习 刻苦钻研操作技术

徒工王秀芹创四十万米无次布优异成绩

新华社沈阳十月三十

日电 辽宁瓦房店纺织厂徒工王秀芹，刻苦钻研操作技术，创造了四十万米无次布的优异成绩。

王秀芹是去年一月到这个厂的织布车间工作

的。她虚心向老工人学习，业余挤时间练习接头，进厂三个月就能看五六台织布机，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在万米无次布的竞赛中，她每天做好接班检查工作，严格把好质

量关，赢得了全省万米无次布竞赛的冠军。

九月十六日，瓦房店纺织厂党委召开庆功大会，授予王秀芹以“优质高产标兵”的光荣称号，给她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机械配套齐全，从翻耕、耙地、施肥、撒药、播种，到中耕、收割、运输、粮食加工，乃至捆秸秆、集粪等，同样的活儿它们都能干。

这些年来，二队也有不少农业机械，为什么劳动生产率没有相应地提高，劳动力不能有效地解放出来呢？除了机械老旧、技术落后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配套差，间苗、除草、掰棒子、捆秸秆、集粪、施肥等等基本上依然靠手工劳动。正象美国朋友赵丁指出的那样：用农业机械种庄稼好比用木桶盛水：一个木桶，由几块木板拼成，只要其中一块短缺，其他的木板再长，水也会盛不住，漏掉了。

新的生产力将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

如果把韩丁说的那只“木桶”放大来看，二队要和韩丁挑战，赶上世界先进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还有好几块短一截子的木板必须补齐。

韩丁一个人种一千七百亩地，平均每天一天生产粮食一万斤。这么高的劳动生产率，其实并不是韩丁一个人创造的，而是他们那里实行专业化分工协作的结果。韩丁生产需要的种子、肥料、农药、农电配件，都由各专业公司负责，只要订好合同，一个电话，有关公司就会送货上门。而我们却还没有做到这一步。例如，今年有一人，火车为二队运来一百吨化肥，通知第二天去车站领取。二队人少活多，农时紧迫，本来无力从事这项工作。但是自己不去就没人给你送来，怎么办？只好扔下农活，全体出动去运化肥。再如，由于没有种子公司供应良种，二队今年采用的玉米种子比较混杂，玉米长得高高低低，成熟期有先有后，推迟了收割期；收割时也影响了作业进度。又如，二队今年用的化学除草剂全部是进口的，以后每年都需要大量的化学除草剂。我国的化学部门需要尽快地研制和成批生产出这种高效优质的除草剂，也是当务之急。此外，二队已经提出可以继续调出一些人力去干别的工作，对他们需要加以妥善的组织 and 培训。总之，生产力水平提高了，要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迅速进行与之相适应的改革。社会是在矛盾中前进的。新的生产力是革命的因素，它提出的这一系列新的问题，必将推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更快地前进。

新华社记者 于有海 黄正根

靠现代科学技术战天斗地

——访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

成龙配套，发挥先进技术的威力

接连几个夜晚，皓月当空，“北大仓”显得更加宁静。室外虽已接近摄氏零度，寒意袭人，室内却热气腾腾。我们向二队的同志提出各种各样的询问，引来了一连串关于现代化农业机械大显神通的“神”话。

地处祖国东北部的“北大仓”，气候寒冷，无霜期短，给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的困难。这里每年只能种一季庄稼，而且老农爷只给一个十天左右的“最佳播种期”。早播了，地温不高，种子发芽率低，影响产量，播晚了，那怕晚一两天，秋收时庄稼青黄，遇上早霜，粮食就会减产甚至失收。所以当地有句俗话说：“过了芒种，等于白种”。多少年来，二队的职工为了同老农爷作斗争，抢住“最佳播种期”，总是人机一齐上，起三更睡半夜，大干苦干拚命干，到头来还不往住事与愿违。那时，因为农业机械效率不高，又没有配套，误了农时。他们记得，一九六九年那场早霜，大地一片白茫茫，尺把长的红穗子的棒子，毛茸茸的豆荚，正在灌浆，却被早霜打得落落了架，眼看唾手可得的丰收成了泡影。这年，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减产近三成。

今年春耕，驾驶员李万金第一个开动引进的“铁牛”。播种玉米时，他驾驶拖拉机牵引着耕耘机松土，作业宽度十八米多，时速十几公里，一天松土一千多亩。播种机一天也能播二千二百亩。往年，二队春播需要半个月的时间，今年不到五天就播完。五天下来，李万金扳着指头一算，好家伙！他和助手两个人，干了全队三分之一的话。他兴奋地说：“看来战胜老天爷夺丰收，光靠不怕苦、不怕累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靠先进的科学技术！”

使用引进的精量点播机播种，使二队今年除了给庄稼间苗这道耗费大量劳动力的工序。以播种玉米来说，我国传统的方法是，一亩玉米下四、五粒种子，等出苗后再间苗，把多余的玉米拔下，留下一棵好苗子。间苗时，由于庄稼人手下的功夫不同，留的苗质

韩先楚、肖华同志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要做到

要解放思想 要发扬民主

新华社兰州十月三十日电 人民解放军兰州部队党委最近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会议结束时，司令员韩先楚、第一政委肖华发表了意见。

韩先楚同志说：搞清楚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问题，可以使他们更好地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从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我们军队的建设。他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真理，是我们行动的指南，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前几年，林彪、“四人帮”大搞假左真右，鼓吹“天才论”、“顶峰论”，“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把毛泽东思想神秘化、绝对化，从根本上反对实事求是这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毛主席对他们这一套早有察觉。一九七一年八月，毛主席在南昌就曾对我说过，什么天才，我不是天才，读过孔夫子、资本家的洋学堂，后来才开始读马列主义。“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马克思列宁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毛主席的这些话，打中了林彪的要害，揭露了林彪的假马克思主义嘴脸。值得注意的是，在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下，一些同志用宗教迷信的方式来对待革命领袖和革命理论，他们不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忘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结果，把自己思想搞僵化了。我们必须解放思想，敢于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禁区，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按客观规律办事。否则，就不可能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

韩先楚同志说，解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对我们抓纲治军更为重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主席为我军建设总结的一整套经验，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但是，我们要搞国防现代化，就必须根据现代战争的特点，研究新问题，摸索新经验。只有不断地解决这些新问题，才能尽快完成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战斗任务，使我们的装备工作经得起实战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

韩先楚同志还谈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掌握各方面的情况，才能辨别是非，弄清真伪。战争年代，我军充分发扬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干部战士敢于讲话，敢于批评上级，敢于争论问题，积极提出各种建议，群众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所以，我们战胜了凶恶、强大的敌人，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夺政权，肆意践踏党的民主生活，动不动就夺权、扣帽子，谁要是对他们那一套提一点意见，就不得了，就说你是在反党反毛主席，搞得人们不敢说真话，不能开展批评。在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下，有些领导同志压制民主，甚至打击报复的意见。我们要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把党的民主作风破坏搞起来，不断加强民主集中制，真正做到广开言路，让群众讲话。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抓纲治军的步伐，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

肖华同志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可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我们现

在正在进行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其重要任务就是要从思想上、理论上和路线上分清是非，正本清源。真理的标准问题不解决，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影响就不可能。现在华主席、党中央反复强调实事求是，中央报刊大力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确实打中了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反动思想体系的要害，是从理论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肖华同志谈到，毛主席最近号召我们，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所谓思想解放，就是彻底砸烂林彪、“四人帮”套在人们头上的紧箍咒，从他们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一个当务之急，就是要进行一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再教育，恢复实践的权威，恢复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这一点，对于我们抓纲治军尤为重要。因为军事是一门极为严肃的科学，军队是要打仗的，来不得半点虚假。不讲唯物主义，不讲实事求是，就要打败仗，就要亡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就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毛泽东思想，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认真总结我军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样，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步子才能迈得更快一点。

肖华同志还就部队如何开展这一问题的学习和讨论，谈了几点意见。他强调，要教育干部战士充分认识学习讨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克服“与己无关”的思想；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推动当前部队各项工作；要领导带头，解放思想，努力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通过学习讨论，真正来一个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跃进。

重在政治表现 坚持择贤举贤

考试成绩优秀的廉解为研究生，受到赞扬

上海交通大学录取出身反动家庭、社会关系复杂，而本人政治表现较好

本报讯 据十月二十六日《解放日报》报道，上海交通大学在今年招收研究生中，录取了一个出身反动家庭、社会关系复杂，而本人政治表现较好、考试成绩优秀的研究生——廉解。

廉解是上海常德中学教师、数学教研组组长，今年三十五岁。他的父亲原是国民党的反动军官，一九五二年因反革命罪被专政机关逮捕，不久被镇压。他的祖先是地主，于解放初被镇压。他有几个舅舅和姨母在台湾，有的是国民党特务，有的是蒋匪军的高级军官。廉解本人的历史是清楚的。他于一九五九年毕业于上海育才中学后，考入安徽大学数学力学系，攻读概率论。一九六三年大学毕业后，因成绩优秀，经学校推荐报考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生，考试成绩名列第二，因政审不合格，没有被录取，分配在上海常德中学当教师。廉解坚信，个人的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道路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只要自己努力，是有光明前途的。在党的教育下，他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坚持自学，除了继续钻研概率论以外，还学习现代数学分支的知识，如规划论、对策论、信息论、数理统计、组合数学等，并自学外语，能阅读和翻译英、俄、德、法、日五国文字的数学专业文献。去年下半年，他在常德中学党支部推荐下，报考交大的应用数学专业研究生，初试成绩为：数学96分+20（附加分），外语94分，其他各科得分平均在80分以上。复试的两门专业课成绩全优，体检合格。

廉解这样的人是否可以录取为研究生？交大党委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对廉解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的政治表现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廉解的工作单位和有关同志的意见。这些关系，廉解的情况作了具体的分析。

廉解的父亲于一九五二年因反革命罪被专政机关逮捕后，他的母亲即与他父亲办理了离婚手续，由长期担任小学教师的母亲抚养成人。他父亲被镇压后，廉解只有九岁。那几个反动的社会关系，都是在解放前跑到台湾去的，廉解都没有见过。这些关系，廉解对组织从未隐瞒。从家庭对他的影响来说，还要看到这样的情况：廉解也有几个姨母是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科研工作者，对廉解关系比较密切，影响比较大的，是他的九姨和十姨。她们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十姨曾获得上海市和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多次光荣地见过毛主席和周总理。

党的一贯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廉解是否真正同反动的家庭划清界限，主要是看他的现实政治表现。廉解的政治表现一直是比较好的。在中学时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一再说：“我出身于这样一个反动的家庭，党没有歧视我，而把我培养成大学生，我应当加倍的努力来报答党对我的培养。”长期来，他勤勤恳恳地搞好本职工作，不害怕，不怕累，争挑重担，他长期担任班主任，他带过的一些班级，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都是全校比较先进的班级。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表现都很好。“四人帮”借批林批孔另搞一套时，他拒绝写那些随意诬陷别人的大字报，经常抵制那些颠倒黑白的“批判会”。“四人帮”大肆诬陷邓小平的时候，他的拒绝写诬陷副主席的大字报。他衷心拥护华主席、党中央，积极投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好教书育人，受到师生的好评。

经过这样的调查和分析，交大党委认为，廉解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虽然复杂，但根据本人的一贯表现，证明他能从政治上、思想上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他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而且是经过较长时间考验的。经过考试和了解，他确实学有专长，业务成绩比较出色，根据党的一贯政策，可以录取为应用数学专业研究生。

在一个人身上落实了政策，影响一大片。廉解被录取为交大研究生的喜讯传到常德中学，师生员工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放鞭炮，刷喜报，象过节一样。学校本来只准备组织各教研组的代表十来人到廉解的家去报喜，结果有四十多人参加。有的教师激动得热泪盈眶，眼含热泪连声说：“共产党伟大，华主席英明！”在党支部举行的座谈会上，许多教师激动地说：“我们为廉解高兴，为交大高兴，也为党高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真正落实了！”有些因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而背着思想包袱的教师说：“廉解的榜样，给我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廉解向党倾吐自己的心愿：“我的一切都是党给予的，我决心为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廉解的录取通知书发到常德中学的当天，有人填了一首《贺廉解》，词的下阕是：“党恩泽英举贤，说甚‘臭九’，功罪凭实践。园好人欢百花艳，放歌十一大路线。”

重在政治表现

《解放日报》短评

应实际斗争需要的。但是，这项政策长期来受到刘少奇，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林彪和“四人帮”大肆鼓吹反动的“血统论”，采取封建统治者株连的办法，对那些家庭和社会关系有问题的人，加上种种侮辱性的称号，因为他们设置了种种人为的障碍，不少人还因为父母和亲属的问题而受株连，遭到残酷的迫害。林彪、“四人帮”搞的那一套，践踏了党的政策，搅乱了阶级阵线，搞乱了人们的思想，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所造成的恶果，尽管华主席、党中央一再指出要坚决贯彻这项政策，有些同志还不大放心，他们还要看一看：重在政治表现，究竟重到什么程度？不拘一格选人才，这个格的标准又是什么？我们想，交大录取廉解为研究生的事实，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当廉解的录取通知书发到常德中学后，许多教师信服地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真正落实了”，这表达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

当然，不好的家庭出身和不好的社会关系，对本人来说，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因此，一贯要求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志在思想上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坚定地站到党和人民这一边来。但是，家庭的影响，只是一个方面，还要看到学校、工作单位以及整个社会的影响。主要是那些青年人，他们大多数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从小就受到党的培养教育，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和道德风尚的熏陶，这些影响对他们的思想的进步起了主导的作用。实践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是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决贯彻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是符合这种实际情况的，是适

团结全党的正确方针



对待犯错误的干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还是动不动就撤职查办，一棍子打死？这是一个涉及到我们党的队伍能不能兴旺发达，能不能团结更多的人干革命、搞建设的大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过：好意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湖南省委帮助安乡县委整风后所出现的团结全党的局面，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干部从关心爱护出发，进行及时有力的教育帮助，这是马列主义政党的干部路线和政策。毛泽东同志在长期路线斗争的实践中，总结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应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犯错误的同志分析发生错误的社

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使他们从中间吸取教训，改正错误，提高觉悟。中共湖南省委在处理安乡县委犯错误的事件中，就正确执行了这一方针：既不掩盖矛盾，又不否定他们过去的成绩；对犯错误的同志既关怀爱护，又一分为二，严格要求。这样做，把压力变成了动力，既振奋了县委领导班子的革命精神，又为下级如何对待错误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这比单纯地撤换几个干部，或者简单地给个处分，更能教育人，更能团结人，更有利于调动积极因素。

当然，对于犯错误的同志着重于教育，并不排除按党章的规定，给予犯错误的干部以必要的纪律处分。即使给极少数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以纪律处分，

不说、二不管的消极态度。经过省委、地委帮助安乡县委整风，矛盾揭开了，大家敞开心扉，开展了批评自我批评，他心情舒畅了，干劲又上来了。七、八月间，正是酷暑高温季节，他头顶骄阳，怀里揣着辆自行车，一天跑五、六十里，深入到六个公社、十七个大队，调查了领导班子和多种经营的情况。回县以后，对如何加强社队领导班子建设，发展多种经营的问题，向县委提出了十条合理化建议。

县委常委、安金公社党委书记汤拯保深有感触地说：这几年，我思想上自满，作风上不扎实，同群众一起干得少了，这样不行啊！现在，他经常在队里跟群众一起劳动，到较后进的乐大队第十生产队蹲点。群众向他反映，队干部作风太盛：去年一年，这个仅有一百人的生产队，就开支了三百八十多元的干部吃喝费用，把群众的积极性吃掉了。汤拯保就耐心教育干部，切实改变作风。这个队肥田源，他又带领队干部干了一口塘，挑了一百多方塘泥。今年，春粮和早稻丰收，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六十四。

在十一生产队的影响下，乐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刘尚发，也主动检查了自己贪图吃喝的不良作风，下决心改正。每年双抢结束时，大队总要吃一次“丰收酒”。今年他从生产队参加双抢回来，有的大队干部已把酒肉带回来，他说服他们把东西交给集体，不再让吃“丰收酒”。于是，在这个队传出了这样几项顺口溜：去年的刘尚发，吃喝都有他，今年的刘尚发，浑身是泥巴，这样搞下去，乐国有办法。

在全县许多地方，干部作风开始有了明显的转变：参加劳动、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多了，浮在上面、凭想当然当领导的官僚主义少了。往年，干部要登门上户催社队出勤；今年，则要劝群众吃好、睡好、休息好，高温天不要中暑，还把皮蛋、海带送到门上。今年双抢，比往年少开了许多会，可完成任务比往年提前了十多天。县委常委会办公室作了个小统计，今年上半年开会费用达六万元，今年只用了两万元。会开得少了，干部却感到工作好做了，原因是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许多干部、群众认为，这样坚持下去，安乡大有奔头，大有希望！

安乡在前进

（上接第一版）这一回大不相同了，大家七嘴八舌当面议论开了。在总结会上，刘淑元同志尖锐地指出：工作抓得不扎实，那里象打翻身的样子，没有按县委决议精神领导群众干。张光彩同志诚恳地接受了大家的批评，表示立即采取诚恳改正，要在晚稻生产上作出成绩来。果然，张光彩同志带头苦干实干，晚稻栽插任务保质保量提前完成，禾苗长势好。七月下旬，县委又在六家渡支部召开了公社党委会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参加的现场会，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推动了全县落实晚稻超平粮的计划。

由于县委知错就改，许多干部群众敢于当面向领导提出批评建议，或写信反映情况。前不久，县革委农村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就直接给县委副书记罗赋斌和杨振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县委进一步改进作风。原来，前些时候县委在安金公社召开了一次各公社、党、委及有关局负责人会议，听取汇报。这次会议以往开会降低了伙食标准，但是公社另买了西瓜、梨子招待。参加会议的人数不多，时间也不紧，却却动了专车和人数。提批评的同志说，这些都是不应该的，如果注意节约，对贯彻中央文件精神，减轻国家和农民负担，改进领导作风，就更有现实意义。罗赋斌和杨振东认为批评得对，立即写了一份检查，并让全体参加会议的同志补交了伙食超支及瓜果费，派人送给安金公社。以后，又把这封信和他们的检查印发给县、党组织，使大家都从中受到教育。

干部挑重担 群众积极干

“干部挑重担，群众积极干，大打翻身仗，长征雄力量”，这几句顺口溜，概括了当前安乡的干部和群众同心干的神采奕奕。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任保华，是在安乡工作二十多年的老同志。前几年，由于县委没有很好地贯彻民主集中制，他对有些问题有不同看法，想讲又没有机会，心情不舒畅；加上身体多病，对有些工作抱着

本报记者 晓 渡 刘 见 初

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最近出现了一批以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及其余毒为内容的短篇小说。从刘心武的《班主任》(《人民文学》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开始,我们陆续读到了吴强的《灵魂的搏斗》(《上海文艺》第五期),关庚寅的《“不称心”的姐夫》(《鸭绿江》第七期),卢新华的《伤痕》(八月十一日《文汇报》),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人民文学》第九期),刘心武的《醒来吧,弟弟》(《中国青年》第二期),等等。这一批作品激起了广大读者和文艺界的强烈反响。许多同志给予热情的赞扬,有些同志就某些作品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报刊上对一些作品开展自由讨论,广开言路,这对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造成生动活泼的局面,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是大有好处的。

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毛主席说过:“戏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评判一篇作品的好坏,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因为人民群众是文艺创作描写和反映的主要对象,是文艺服务的主要对象,又是文艺作品最直接、最经常、最广泛的鉴赏者。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智慧。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不是少数人说了就算数的,而是要通过实践的检验,由广大人民群众来评定。在这方面,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他们会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这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愿望和要求的标准)去衡量和判断。《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等短篇小说刊出以后,广大读者争相传看,议论纷纷。他们在表示热情欢迎的同时,也针对某些作品的不足,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和希望。这就充分说明,人民群众是有判断是非的能力的。因此,评论文艺作品要多听群众的意见。对文艺创作和评论中的是非问题,靠行政命令来解决是不好的。

《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等作品的出现,是揭批“四人帮”斗争深入发展在文艺创作中的反映。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设置许多禁区,制造种种禁令,扼杀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弄得“百花齐放都没有了”,“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整个文坛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清算林彪、“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冲破他们设置的禁区和禁令,在题材、体裁、风格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班主任》等一批以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及其流毒、影响为主要内容的短篇小说的出现,就是文艺工作者进行探索的初步成果。尽管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许多作者是初学者写作、缺乏经验的青年,作品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大部分作品的根本倾向是好的。我们应该肯定作家,特别是青年作者总结经验,改正缺点,在实践中进一步提高。作家们敢于拿起自己的笔投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战斗,敢于对现实生活中许多问题作思考,敢于反映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所造成的人民群众生活和精神上的“伤痕”,敢于在艺术上作大胆大胆的尝试,是很可贵的,应该给予热情的支持。在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中,应该允许这些新花开放。

一个反革命的共同纲领

——批林彪、“四人帮”合谋抛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

《上海文艺》评论员

反革命“两杆子”的结合

一九六六年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四人帮”这一伙反党野心家首先文攻武上,达成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他们合谋抛出一个“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个“黑线专政”论非同小可,它是这两个反党集团阴谋篡党夺权的共同纲领。

二月下旬,张春桥在与江青的那个亲信(即在部队搞“放火烧荒”的那个“纵火犯”)一起加紧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时候,向后者透露:“这个问题我和江青早就有议论,但一直没有个适当机会提出来,现在才有机会提出来。”

原来,江青和张春桥对于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是蓄谋已久的。他们野心勃勃,想以文艺为突破口,先搞文艺夺权到手,进而篡夺党权和国家的所有权。江青说:‘我没有什么权,说话没人听,我要借用林总的力量,我要敲锣。’原来“文艺黑线专政”论有无数机会抛出,关键在于是否“搬”动了林彪这个“尊神”。

这位“尊神”为什么一搬就动,如响斯应呢?因为他十分懂得造舆论的重要性,据说“政治是用笔杆、嘴巴”的,利用江青一伙的“笔杆、嘴巴”,就可以大树自己“正确路线代表”的“崇高”形象了。

正是由于林彪与江青早有往来,互相换了牌,所以江青在一下旬跑到苏州找林彪密商,才能一拍即合。林彪安排江青召开一个所谓座谈会,事前,由他的老婆向与会者传达“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江青“意见”的指示,为江青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提供讲坛。于是,二月二日在上海,所谓的座谈会就开始了。这个会的气氛异乎寻常。到会的一律不得穿军装。会一开始,江青就宣布不准记录,不许外传,特别不能“让北京知道”,还十分紧张地询问有人“带窃听器没有”。为什么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召开的一个座谈会,要搞得如此诡秘呢?它为什么因野心的搞阴谋活动见不得人。于是,在会上江青肆无忌惮地讲开了,整个会成了她的“一言堂”。她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存在着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集团”,并歇斯底里地叫嚷:“这条黑线专了我十七年的政,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这是我们去专他们政的时候了!”这就是“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开端。

竟然有人“黑线”“专了”江青“十七年的政”,真是有一条贼心听闻!江青是怎么被“专了政”的呢?查一查建国以来的文艺发展史,实在找不到一点根据。不过,十七年来,江青在文艺界抓权掠权那一点搞得很不顺手,常常被主管文艺工作的周总理以及其他革命领导同志挡了回去,倒是真的。原来,江青搬来林彪这位“尊神”,为的是扭转局势,变来“专了政”为“专他专政”,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其他革命领导同志。

座谈会结束后,整理了一个稿子。

努力写好革命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

本报评论员

运用各种文艺形式揭露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及其流毒、影响,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文艺是反映生活并反作用于生活的。一个对革命对人民负责任的作家,要正视而不要回避现实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是我们时代现实生活中最重大的问题,因而也是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重大题材之一。现在,“四人帮”虽然已被粉碎两年了,但是林彪、“四人帮”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流毒和影响,在我国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还严重存在,清除这些流毒和影响,还需要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作出巨大的努力。正如华主席指出的,揭批“四人帮”仍然是全国人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用文学艺术的手段,积极投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应该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选择不同的题材,从不同的角度,对林彪、“四人帮”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打,对他们那条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人民群众身上的“反伤”进行批判和鞭打,帮助人民群众进一步认清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本质,认清他们推行的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恶果,使人民群众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更加仇恨林彪、“四人帮”,更加热爱华主席领导下的新历史时期的美好战斗生活。

文艺作品对林彪、“四人帮”罪行及其流毒、影响进行揭露,不能不说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些作品就是“暴露文学”。我们的文艺创作,对于林彪、“四人帮”一伙黑暗势力以及旧社会剥削阶级所遗留的恶劣影响是应该加以暴露的。毛主席说:“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林彪、“四人帮”是一伙新老反革命组成的黑帮,是我们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们就是剥削者和压迫者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出现是旧社会污泥浊水的沉渣泛起。对于他们这一伙,我们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革命的舆论,包括革命的文艺,进行揭露和批判;对于他们所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也要通过揭露和批判,加以肃清。这种揭露和批判,正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正是歌颂革命人民不可征服、不可战胜的坚强意志,怎么能说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暴露文学”呢?

文艺是通过艺术形象,通过典型化的方法反映生活的。因此,运用文艺形式揭露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及其流毒和影响,必须解决好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文艺工作者要把“日常的现象象中起

毛主席在许多著作中都已根据历史的事实,对三十年代文艺作了科学的評價。他说:“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这一段话,肯定了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是我国自“五四”开始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肯定了它对新兴民主主义革命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成绩和贡献的主要表现是它在极其艰苦的白色恐怖的环境里,在政治上坚持了反帝反封建的鲜明立场,在文艺上举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旗帜,打垮了国民党的空前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在反“围剿”的斗争中创造了中国文艺革命的伟人。一大批的文艺新军在党的领导下,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迅速成长起来。

伴随着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发展而到来的,便是国民党反动派加之于它的更为残酷的迫害与镇压。而在三十年代参与“围剿”左翼文艺的流氓、侦探与走狗之中,就有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姚蓬子和叛徒江青之流。时隔三十余年之后,他们又和林彪合谋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否定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继续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未竟事业。

林彪、“四人帮”对三十年代文艺史上的“围剿”阵,不仅是为了翻历史的案,更重要的是为了把建国以来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文艺说成是从“黑根子”上长出来的“黑线”,诬蔑十七年社会主义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所谓“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

林彪、“四人帮”所胡造的那条所谓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文艺黑线”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捏造出这样一条“黑线”来,是要图从文艺界打开口,翻民主主义革命的案,翻社会主义革命的案。这就是林彪、“四人帮”共同“商议”的反革命协定的第一个重要内容。

林彪、“四人帮”不仅把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革命文艺路线诬蔑为一条“黑线”,而且把社会主义文艺队伍打成“叛变了”“烂掉了”“掉队了”的“黑班底”,叫嚷要“重新组织文艺队伍”,这是经不起事实的驱斥的。

我国解放后的文艺队伍,经过历次斗争,特别是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充分说明它是好的,是无产阶级觉悟的。当然,由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存在,它也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受到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破坏,受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袭。但是,历史早已证明:第一,这些干扰和破坏来自不同的方面,没有扭成一条一贯之流的“黑线”,没有“黑线”,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黑线人物”。第二,这些干扰和破坏有的属于敌我矛盾,如胡风;有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俞平伯和文艺界个别搞同志所犯的思想认识错误,不能一概以“黑”来概括问题的性质。第三,虽有这些干扰和破坏,但由于有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和培育,由于“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越的条件。政权的根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所以十七年来这支队伍的主流始终是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前进的。

对于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始终坚持革命、坚持前进的文艺队伍,林彪、“四人帮”却要被打成“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黑线人物”,也是妄图从文

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毛主席提出的这些原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等作品所描写的事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短篇小说的作者在不同程度上对社会生活的某一本质的方面进行了较好的艺术概括。但是,其中有的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还可以提高。比如有的作品如果描写人民群众的力量,表现人民群众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更充分些,就可以塑造出更为生动更为典型的同“四人帮”作斗争的英雄的艺术形象来;有的作品的某些情节、细节的真实性还可以多推敲一下。许多读者对某些作品提出的批评和希望是有道理的。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都有它的两重性。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在“四害”横行时期,一方面是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凶残,另一方面是革命人民英勇的斗争。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首都人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声讨“四人帮”的英勇搏斗,全国各族人民以各种不同形式反对“四人帮”斗争的正义行动,不就是历史的见证吗?尽管作家选择的题材和表现的主题有所不同,不能作刻板的规定,但就本质上说,文艺创作对于林彪、“四人帮”一伙黑暗势力的揭露和批判,在暴露他们的罪恶的同时,还必须充分表现人民群众它所进行斗争的力量,要写出人民的力量,要显示出人民必胜的前景,要塑造出同这种黑暗势力作斗争的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我们时代的时代精神,使人们通过艺术形象的教育感奋起来。这样才能很好地发挥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这是现实生活中本质的方面,如果忽略这一点,作品的艺术成果是会不同的。

我们时代的斗争生活是绚丽多彩的。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及其余毒和影响为内容的作品是文艺创作的一个方面,但光有或主要是这方面的作品是不够的。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文艺创作的题材要多样化,以现代生活题材为主,特别要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的三大革命运动,也要重视历史题材和其他题材。”华主席还指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有雄心壮志,努力作出反映伟大革命、周总理、朱委员长和其他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业绩,反映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的战斗历程的优秀作品。”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经历了漫长的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斗争,创造了伟大的英雄业绩,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今天,全国各族人民继承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遗愿,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精神而进行的长征。中国人民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斗志是高昂的,精神是振奋的,八亿人民正在以巨人般的步伐,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目标挺进。我们的文艺应该谱写我们时代的英雄凯歌,唱出我们时代的最强音。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工厂、农村、部队,深入生活,努力搞好创作,用各种文艺形式,反映出新长征中各种英雄的事迹,塑造出新长征中的各种英雄人物,描绘出我们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壮丽图景来!”

文艺阵地打响反对所谓“民主派”“走资派”的第一枪。而所谓“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就是要按照这两个反党集团的“模式”拼凑大小舰队和帮派集团,在文艺阵地上构筑篡党夺权的桥头堡。这就是林彪、“四人帮”共同“商议”的反革命协定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所谓“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文艺黑线专政”论一出笼,林彪就如获至宝,吹捧这个谬论“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经过十年级别斗争严峻事实的检验,这段话的恶毒含意已彻底暴露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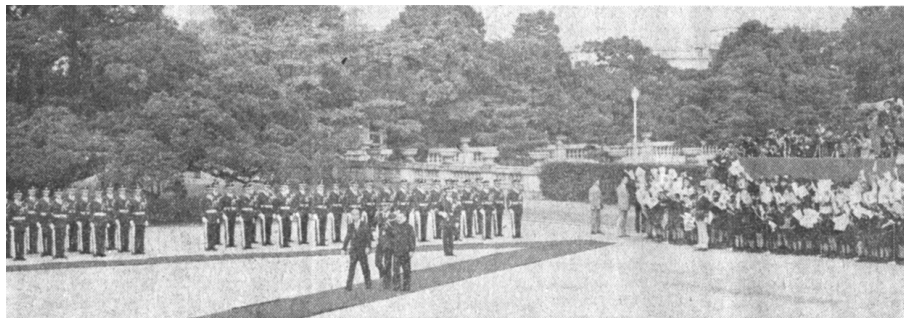
什么“现实意义”,什么“历史意义”,拆穿了讲,它的全部“意义”不外是两点。首先,通过这个共同纲领的公布,宣告了两家合伙经营的反党黑店的开张,并作为一股反革命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意义”还有一层,“文艺黑线专政”论,基本确定了他们篡党夺权的纲领、方针和步骤,即从文艺打开口,突破关键,推向全面,把“黑线专政”论打开四扇窗,方破铁杀过去。林彪在这个共同纲领出笼后不久,就急不可耐地对合伙的笔杆子们点出要害:“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提大闹,这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此后十年,他们正是这样干的。教育战线首先当其冲,臭名昭著的“两个估计”是“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翻版。十七年教育路线被打成“黑线”,队伍被打成“烂”的。整个文教卫生战线无一幸免,新闻、出版、体育、卫生等等相继成了“黑线专政”。他们的目的在夺权,在搞反革命政变,于是,公安、政法等等国家机器是他们的当然目标,他们大搜大闹,妄图摧而毁之,取而代之。江青反复叫嚣公安机关“解放后一直是黑线统治着”,“比过去国民党还坏,是法西斯”,“是反革命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要“彻底砸烂公检法”。张春桥狂叫:“现在的国家机器要彻底砸烂,另起炉灶”。林彪俨然以挂帅者的身份下了结论:文化大革命“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涂抹得一片漆黑。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就公然提出了“改朝换代”的口号。

上层建筑全盘打光,经济基础也不能放过,林彪提出:要“破大工交战线”基本上让了毛主席路线,和文教系统不同的观点”,要让“黑线专政”论席卷全国,铺天盖地地打向工商业各个基层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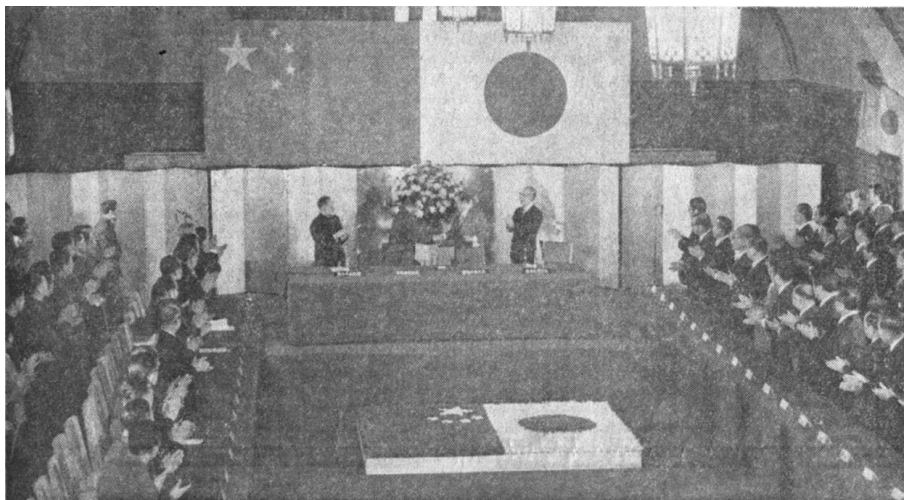
“文艺黑线专政”论已经破产了,但它的流毒,仍不可低估。这种谬论之所以猖獗一时,是有其社会历史根源的:一则由于这种谬论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对历史唯物,搞假左真右,具有极高的欺骗性;二则由于中国曾经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主观片面性和好恶极端,使他们的容易受极“左”的煽动和口号的迷惑和影响;三则由于我们建国以来对宁“左”勿右思潮的揭露和批判不够,因而就看不透左倾掩盖下的极右实质。正如周总理在批林时深刻指出的:“‘左’的批不透彻,‘右’的还会来”,“极‘左’思想不批透,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鉴于此,在第三战役中,联系实际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彻底剥去其“左”的伪装,还其极右的真面目,分清思想、理论、路线是非,就是十分必要的了,不然,文化专制主义在一定条件下以某种方式复活,仍然是不可能的。(原载《上海文艺》第九期,本报有删节)

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



◇ 十月二十三日，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国宾馆前举行正式仪式，热烈欢迎邓小平副总理。

◇ 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副总理同福田赳夫首相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第一次会谈。



◇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十月二十三日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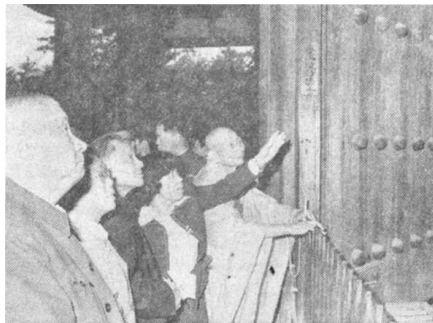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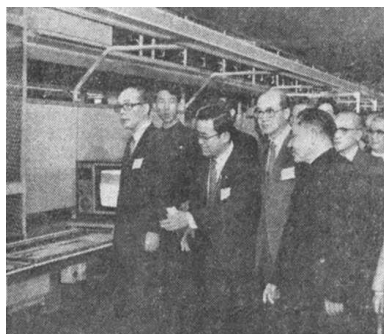
◇ 十月二十四日，日本国会两院议长举行盛大室外酒会，热烈欢迎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



◇ 十月二十四日，日本十个友好团体在东京联合举行盛大酒会，庆祝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生效，热烈欢迎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

◇ 十月二十八日，日本奈良市群众热烈欢迎邓小平副总理一行。

◇ 十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副总理参观日产汽车公司的座间工厂。



◇ 十月二十八日，邓小平副总理一行在大阪参观日本松下电器公司。

◇ 十月二十八日，邓小平副总理一行在日本奈良参观唐招提寺。

◇ 十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副总理一行雨中游览京都“御所”。（本版照片为新华社记者摄）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记者

何英副外长首先讲话。他重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地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恢复民族权利和收复失地的正义斗争。

十月二十七日播发的通讯：《岚山愈见姣妍》，第十段和十一段中“见到一点光明”，均应为“见着一点光明”。（见本报二十八日第五版）

